

哲學思維與科學問題——讀 何懷宏先生〈預期壽命與生命之道〉 一文

邊 林

近來傳播媒介的諸多消息中，北大哲學家是長壽群體的消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當中更有知名學者為此有精力和興趣做專門的研究和思考。讀罷何懷宏先生〈預期壽命與生命之道——以當代中國哲學家與法國哲學家為例〉(2014, 51-64)一文，我們不僅了解到北大哲學界泰斗和大師們總體的生命和健康狀況，也知曉不少這些哲學大家生活方式、生命態度與他們生活經歷（甚至可以說心理狀態）的可能關聯性。何先生得出的一些結論不無道理，值得深思。不過，有些認識和判斷也還是需要討論。

何先生文章中其實隱含着這種邏輯推論：中國傳統的生命之道是法國文化中沒有或者缺少的，中國（北大）哲學家正是遵循了這種生命之道，所以他們的壽命整體上比同時代法國哲學家長，因此不同的生命之道和對它的踐履可能是帶來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又因為兩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在統計學上的反映正好相反，這種普遍長壽現象只反映在中國具有哲學意味的思想家群體中，因而哲學（思想）家們才可能是真正理解、把握和運用了這種生命之道的一個特殊群體。

邊 林，河北醫科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中國石家莊，郵編：050017。

何先生給出的中國哲學大家們預期壽命的那些資料，應該說從統計學意義上看還是有科學分析的價值的。這些哲學家唯一的共性就是都長年從事哲學（或者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和相關專業的教學，大多都生活和工作在北大這個特定環境中，因而長壽成為這個群體中一種普遍現象，也就意味着他們個人生活中其他的因素，比如遺傳因素、個人經歷、婚姻狀況、家庭狀況、個人愛好、生活習慣、保健狀況等等對他們健康狀況產生的影響作用，都消解在他們所具有的姑且說是職業哲學家、思想家這個要素中了。當這個特定環境中的哲學家的預期壽命普遍高於中國或者北京市人口的壽命，那麼這些哲學家的健康就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現象。至於與中國哲學、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命之道有沒有關係、有多大關係，如同何先生這樣，在與法國哲學家的比較中去推論或聯想，雖不無一定道理和價值，但是用哲學的思維和方式去分析和猜測哲學家的健康秘笈，並推斷他們的健康長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生命之道作用的結果，未免有些臆斷和遐想。如果要得出科學的結論，與同時代法國哲學家的橫向比較是一個方面，北大哲學家群體自身的持續性縱向比較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原則上講，還應該選擇北大非哲學家、思想家群體（最好是非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作為對照組進行比較才更合理。而且，還需要採用健康社會學、醫學統計學乃至實驗心理學等一系列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這樣說，何先生提出了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或者現象，然而假設只有“哲學意味的思想家”對生命之道的理解和把握才足以讓人變得健康長壽之說是否合理？哲學是否真的就是這種神奇的靈丹妙藥，或許都是哲學思維不能解決的科學問題。

何先生的研究，是選擇了兩個比較物件即以北大哲學家為核心的中國“具有哲學意味的思想家”和法國哲學家，其實這樣的研究方式，已經多少有些被科學研究方式傳染了的傾向。一方面哲學家的健康長壽是用年齡為主的數位來證明的，並不是模糊的和一般性議論。用資料和具體人物來說話，很顯然這是科學認識的方式；再

就是因為一般的社會醫學、健康社會學等學科運用醫學統計學方法的研究都選取對照組，而何先生的文章同樣也選擇了中法兩國同時代的哲學家進行比較研究。論證北大哲學家群體的長壽與中國傳統的生命之道有必然相關性，拿幾個同時代的法國哲學家個體來進行反證，似乎顯得不是那麼具有說服力。其中有這樣幾個問題需要討論，也是求教於何先生。一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是一種什麼關係？有學者認為，“從西方哲學的視域看，自黑格爾始，西方主流哲學便未能給中國哲學以應有的地位。”（楊國榮，2014，101）直到現在西方著名大學的哲學系都沒有設置“中國哲學”課程。也就是說，“對主流的西方哲學來說，中國哲學算不上真正意義的哲學。”（楊國榮，2014，102）這裏我們不是想討論作為哲學的中國哲學的地位問題，而是想說，如果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本來就是兩個都只是自喻為哲學但實際上並不不同的東西，被用來作為何文研究內容的根據，這種對照組的選擇是沒有意義的。二是即便中西方文化傳統、哲學和思想研究的指向有較大差異，正如何先生在文章中分析的那樣，這種差異“最根本的可能還是中西基本‘生命之道’的不同，中國之道，道法自然；西方之道，道尚競爭。”（何懷宏，2014，51-64）然而，是不是那個時代法國的以人為研究中心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哲學家的思想中就真的沒有值得充分肯定的“生命之道”嗎？或許當時的法國社會和政治環境決定了存在主義哲學家對生命、存在、人等所做的思考有自身的特性，但絕不意味着他們的思想就一定完全與人的生命成長規律相悖的。薩特 (Jean-Paul Sartre)對弱者的同情、對名利的淡泊，富有之後生活的簡樸以及廢寢忘食的寫作，這些德行不僅崇高，而且帶有中國“生命之道”的味道。僅拿薩特的私生活為例，並以此作為影響他壽命的推測根據，似乎有些簡單化，也不那麼厚道。薩特思想在世界特別是西方哲學界和思想界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可能只有極少中國哲學家可以企及。

本文無意否定何先生文章所推崇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生命之道”的價值，這種價值真的可能有益於人的生命過程及其結果即長壽上。其實中醫學養生保健的很多原則乃至具體的診治過程，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這種生命之道的精神。何先生文章中的很多分析是很到位也很理性的。最贊成的還是何先生文章最後一段說的那些話，思想家們的長壽並不能成為評價他們思想對人類貢獻的根據。(何懷宏，2014，51-64)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豐富的人生哲理和生命之道，在可以成為國人生命信條和生活座右銘的同時，也一定要防止成為一個社會缺乏進取精神、弱化奮鬥意志，或過度追求舒適、安逸、平靜生活過程的思想基礎。正如哲學家的健康長壽問題是十分複雜的問題一樣，對中國傳統“生命之道”的肯定和推崇，也要看到作為一種健康文化可能對社會整體發展帶來的影響。沒有人不希望自己健康長壽，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命之道”可能還不足以擔當這份重任。

參考文獻

- 何懷宏：〈預期壽命與生命之道——以當代中國哲學家與法國哲學家為例〉，載范瑞平編，《中外醫學哲學》，2014年，第XII卷，第2期，頁51-64。
 HE Huaihong. “Life Expectancy and Way of Life—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rench Philosop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edited by FAN Ruiping, 12:2(2014), pp. 51-64.
- 楊國榮：《哲學的視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YANG Guorong. *On the Philosophical Horiz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